

◀ (上接2版)

声。在他死后两个月,就有人在报纸上撰文攻击他的作品甚至人格,因为他并没有拿出黑人作家“应有”的样子去严厉地批判社会问题(Helen Caldwell. 同书, p.8)。毕竟,巴西曾是世界上最大的蓄奴国,也是整个美洲最后废除奴隶制的国家,废奴法令生效的那一年(1888年),阿西斯已经快50岁了。

阿西斯从不愿向人坦言自己有四分之一的黑人血统。他的母亲是白人,靠替人洗衣服为生,在阿西斯9岁那年就撒手人寰。他的父亲是一名黑白混血的粉刷匠,爷爷则是一名被解放的黑奴。他还有一位黑白混血的继母,她对阿西斯视如己出,但据说阿西斯并没有尽到赡养的义务。

这样的身世在巴西其实并不罕见,多数巴西人都是混血。而且阿西斯的家庭在当时已经算不上赤贫,他的父母都识字,而且已经摆脱了奴隶的出身,可以算作工人阶级了。在莫泽看来,阿西斯的自卑感与他和上流社会的交往不无关联。在当时的上流社会,跨肤色的混血并不多见,这显然使从青年时代就混迹其中的阿西斯有些尴尬。好在他还是得到了各色人等的青眼,一位神父教会了他拉丁文,法文则是由一位移民面包师教会的。17岁那年,他开始在一间印刷店打工,从而结交了一批知识分子,很快他就出版了自己的诗集,并在一个颇有影响力的小圈子里得到了不错的反响,小说处女作《复活》(Resurrection, 1872)

也正式确立了他在批评界的良好声誉。

而除了他自身的境遇,时代的学术风潮也让他身处知识界的阿西斯感到左支右绌。在“科学种族主义”(包括它的近亲——社会达尔文主义)甚嚣尘上的那段年月里,知识分子们一心扑在奴隶制的“宝贵遗产”上废寝忘食。他们认为种族应当独立发展,异族通婚则会导致种族劣化。带有种族偏见的伪科学让一心期盼现代化的巴西人民陷入了绝望:这个拥有着不可逆转的异族通婚率的国家,注定将永远低人一等。

阿西斯在死后被巴西官方“供上神坛”,不仅因为他杰出的作品,也因为他的黑人血统。以巴西社会学家吉尔贝托·弗雷雷(Gilberto Freyre)1933年出版的《主与仆》(The Masters and the Slaves)为首,一系列著述使得混血身份在巴西摆脱了污名。随着这一思潮的兴起,阿西斯的黑人血统,这个让他终生感到恐惧和耻辱的身份,摇身一变,成为了整个国家的光荣。20世纪初,在美国“三K党”(Ku Klux Klan)死灰复燃之时,巴西却以它对种族的宽容态度展示了这个国家的包容与多元。这一主张被一些学者称作“种族民主”(racial democracy),而巴西之前残忍的奴隶制度则似乎被选择性地遗忘了。

对巴西官方来说,将一个混血儿奉为巴西最伟大的作家毋宁是推行新政的上上策,阿西斯当是这个宝座的不二之选,尽管他本人可能会为此感到难堪。



从葡萄牙殖民者手中获得解放的巴西文人很注重本土意识,诗人贡萨耳维斯·迪亚士(左)曾出版过印第安史诗和图皮语字典,小说家乔塞·德·阿伦卡尔(右)则将印第安人——尤其是女性——置于新神话学的核心位置。



阿西斯如今已成为了巴西的国家象征,他留着长胡子的形象随处可见。

图片来自 <http://omartelodenietzsche.com>

温和的批判者

在批评家眼中,阿西斯可以与欧洲文学史上的巨人们并驾齐驱。茨威格称他作巴西的狄更斯,艾伦·金斯堡则将他比作卡夫卡,哈罗德·布鲁姆认为他是劳伦斯·斯特恩的苗裔,今年去世的作家菲利普·罗斯则将他视作贝克特的前身。从爱伦坡、契诃夫、乔伊斯,到博尔赫斯、纳博科夫还有卡尔维诺,都被当作过阿西斯的参照。批评家帕鲁尔·塞加尔(Parul Sehgal)在最近发表在《纽约时报》上的文章中,则将阿西斯比作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丽丝·门罗。

作为巨匠级别的作家,阿西斯的文风却并不晦涩,而是和他画像上的神情一样质朴。他的葡萄牙语甚至没有沾染时代的风气,既没有浪漫主义的矫揉造作,也没有神话学辞典中常见的本土化语汇。但是,在质朴冷静的文风之外,他的作品又带着一种让译者无从下手的怪异感——大量的反语和诙谐的笔触令他的本意难以揣度。而马哈雷特·胡尔·科斯塔(Margaret Jull Costa)与罗宾·帕特森(Robin Patterson)还是英勇地完成了这一任务。由二人翻译的英文版《马查多·德·阿西斯小说集》(The Collected Stories of Machado de Assis)已在今年6月12日由赖福瑞特出版公司出版。这本1000多页的书收录了阿西斯一生中的中短篇佳作,将阿西斯40余年写作生涯中的风格嬗变清晰地呈献给了读者。

莫泽认为,阿西斯头两

部小说集包含了所有典型的19世纪小说要素:马车中的惊鸿一瞥,冷若冰霜的少女,以及改变人生的巨额遗产。作品中有像奥勃罗莫夫一样的年轻人,被困在自己温暖的床上;也有那些每天做SPA、读法国小说、盼望嫁给富家子弟来偿还债务的贵族小姐。阿西斯的早期小说多围绕婚姻与贵族女性,在情节上并没有多大的亮点,语言也偶尔落入烂俗,但他强烈的讽刺性和自我意识已经初露锋芒。帕鲁尔指明,这些特征与当时小说的受众有关,阿西斯早期作品的预设读者,恰恰是故事里那些有钱有闲的上层女性,这些作品的题材无疑是在迎合读者的趣味。

第二部小说集《午夜传奇》(Histórias da meia-noite, 1873)与第三部小说集《散乱的文件》[Papéis avulsos, 1882; 李均报译作《零散的纸张》](《精神病医生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4)。有关此书译名,朋友韩女士为译者提供了重要参考意见,特此致谢]之间相隔的九年奠定了阿西斯文学巨匠的地位。在这期间,他的长篇代表作《布拉斯·库巴斯死后的回忆》(Memórias Póstumas de Brás Cubas, 1881)问世,风格也脱胎换骨,由温存的罗曼史作者摇身一变为刻毒的讽刺家——他就此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。《纽约时报》记者拉里·罗特(Larry Rother)在一篇旧文中指出,阿西斯的风格转向和他40岁之后癫痫症状的加重相关,疾病改变了他的体察世界的方式。

《精神病医生》(O Alienista)是第三部小说集中

的代表作之一,在这部作品中,读者看到的不再是被抛弃的情人、千方百计骗取遗产的浪荡子,而是一位从葡萄牙留学归来的“大学问家”——西蒙·巴卡马尔特(Simão Bacamarte)。这位冷静的科学家惊奇地发现,在他居住的小城伊塔瓜依,哪怕是看上去最正常的居民,都或多或少地有些疯魔。很快,在他的回春妙手之下,差不多整个城镇的居民都住进了他建立的精神病院“绿房子”。最终,他推导出一个惊人的结论:越是外表顺从、道德高尚的人就越疯狂、越危险。在一番深刻的自我剖析之后,他将自己关进了精神病院,七个月后,一命呜呼。

阿西斯的文字之所以有趣,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善于面无表情地说反话。曾将《精神病医生》搬上银幕的巴西导演佩雷拉·多斯·桑托斯(Pereira dos Santos)就将他比作“语言的巫师”。阿西斯的叙事永远间接而迂曲,他对政治和道德的表述也是如此:早期作品在迎合上流社会趣味的同时,也将这一群体的肤浅、贪婪与懒惰暴露无遗。如此看来,批评家们对阿西斯“漠视社会现实”的指控或许是一桩错案,因为阿西斯的社会批判是绝对含蓄的。《字典》(出自小说集 Páginas recolhidas, 1899)可谓典型的阿西斯式政治讽刺。故事中的独裁者自幼“绝顶”,于是强迫全国人民一起剃光头,理由显而易见:“道德的一致要从头抓起!”

如果日常生活是一种病态,那么阿西斯肯定知道将大